

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

余英時

這兩三年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於文化認同好像都產生了種種困惑。海峽兩岸的「返本論」傾向使我深感憂慮，這一傾向繼續發展下去是會造成災禍的。中國今天確有文化認同的危機，但解決之道決不在於煽揚民族狂熱的情緒。

冷戰結束已經三、四年了，世界的文化狀態呈現出一種新的變化。最扼要地說，即從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抗，一變而為多民族、多文化之間的衝突。這一變化自然不是最近幾年才發生的，不過長期掩藏在意識形態的表象之下，沒有受到注意罷了，例如前南斯拉夫、前蘇聯內部所潛伏的民族和文化的危機，一直要到共產主義體制崩解之後才全面爆發出來。中東伊斯蘭教的文化與西方的衝突更是源遠流長，但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則因兩大陣營的抗爭而處於依附的地位。我們可以說，冷戰結束以後，構成世界的基本單元又回到了民族、國家、文化，而不再是甚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自由」與「極權」這一類的二分法了。但是今天，民族、國家、文化的分量已與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中葉大不相同。在那個時代，世界主義的思潮流行，國家和民族都被看作過渡性的組合，文化在當時的一般觀念中更不重要，僅僅是經濟、社會結構的寄生物；文化雖因民族而異，但並不足以限定民族的發展，而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最後都不免趨於大同小異。然而在後冷戰時代，愈來愈多人相信每一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質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是不會消失的。俄國和東歐的許多民族傳統在共產主義解體後迅速地復活，已為文化的深厚潛力提供了最可信賴的證據。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據此建立一種「文化決定論」，不過長期以來支配着史學界的經濟決定論則確已到了不得不修正的時候了。

在這一新的形勢下，文化多元論逐漸取得了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承認，在美國如此，推之世界各地也無不如此。承認世界文化是多元的，這便突破了西方文化在現代世界的獨霸之局。但是這一發展雖有重要的正面意義，卻也帶來一個潛在的危機，即極端民族情緒和「原教旨論」的泛濫。中東伊斯蘭教的原教旨論便是一個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實例。1978年薩依德(Edward W. Said)發表了著名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引起了巨大的迴響。這本書暴露了西方的

「東方學家」的偏見，把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描寫成西方高度文明的反面。他認為這是西方學者、文學家、哲學家等在有意無意之間企圖建立世界性的文化霸權。因此他號召阿拉伯世界的人起而反抗，同時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認同，不能輕易接受西方文化為普遍的價值標準。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是主張文化多元論和文化相對論的一部最重要的發難之作。文化多元論不失為一個健康的觀點，但文化相對論如果推行過遠則有流入極端族類中心(ethnocentric)的危險，從而排斥一切「非我族類」，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依照這種極端的看法，則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只能是一封閉系統，而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真正溝通將是不可能的事。這不但在道理上說不通，並且根本不合乎歷史事實。薩依德有鑒於此，所以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他轉而強調今天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已經沒有一個能保持它的純粹單一的民族原型了。所有文化都含有其他文化的成分，換言之，都是異質的混合體。更由於西方近代文化的無遠弗屆，其中有些源於西方的文化因子已變成整體人類遺產的一部分了(他特別指出貝多芬的音樂為例)。他不贊成有些美國人過度對西方文化傳統抱持着的優越感，但他也同樣反對阿拉伯人針鋒相對地提出阿拉伯人只讀阿拉伯的典籍，只採用阿拉伯的方法這一類的偏狹觀點^①。

通過薩依德這兩部書，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印象，即從冷戰時代到後冷戰時代，世界思潮似乎已脫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互相對抗的舊格局。每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已不僅僅是乞靈於自己的傳統，而且是同時向其他文化開放，並擇其善者而從之。這一思潮現在已普遍地展現在西方許多學術領域之內，包括哲學、史學、文化研究、文學批評、人類學等等。西方主流學術界和思想界已明顯地放棄了以西方文化為普遍標準的舊偏見。如果我們今天已很難指出誰是西方帝國主義文化的代言人，那麼文化民族主義事實上也失去了抗爭的對象(這裏不涉及西方內部——如美國——有關多元文化的爭論。在內部爭論中自然還有白人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對抗，以及男性中心文化與女性主義之間的對抗)。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目前世界文化思潮的一般趨勢。但是這篇短文真正關懷的問題則是今天中國的文化認同危機。這兩三年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於文化認同好像都產生了種種困惑。大陸上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新國學」運動的提倡、宗教意識的抬頭，都可以看作是對於文化認同的尋求。在形形色色的尋求之中，我們似乎又看到一股文化民族主義的暗潮在激盪着並且還或多或少受到官方的鼓勵。中國大陸上的官方意識形態現在顯然失靈了，文化民族主義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這大概是官方用「中國文化」、「世界儒學聯合會」之類的東西向外進行「統戰」的一個主要理由。中國知識份子之中自然有不少人是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一個多世紀以來激動心弦的文化符號對於他們依然是會引起儲蓄反應的。用「民族大義」、「愛祖國」這一類的觀念激起他們對於想像中的「帝國主義」進行抗爭，大概是可以收效的。今年五月間，我

有機會在香港三聯書店瀏覽，發現書架上充斥着有關「周易」、「氣功」之類的書籍。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說明文化民族主義不僅對於知識份子有感召力，並且有更大的社會基礎。這使我聯想到一位俄國史學家對於今天俄國思想狀態的描繪。據他說，馬克思主義失靈以後，俄國只剩下了一片「哲學的空白」。其結果是許多人竟順手亂抓一切荒謬的東西來填補這片「空白」，從神祕主義、「旁門左道」(occultism)到侵略性的沙文主義都大行其道。蘇維埃帝國的崩潰也誘發了人們操縱歷史記憶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緒，於是有些人便在舊神話的殘骸上重新編造新的神話^②。這是很值得比較研究的思想現象。由於傳統不同，中國大陸上還沒有發展出明顯的「原教旨論」運動，但上述的文化民族主義即是與「原教旨論」屬於同一性質的東西。所以我認為 fundamentalism 在中國也許應該改譯作「返本論」，這就可以用之於文化民族主義了。

台灣近幾年來也有一種文化認同的危機，一部分知識份子只認同於「台灣文化」，根本不肯承認「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聯繫。1993年12月，我偶然批評了台灣學術文化界「泛政治化」的傾向，指出台灣文化雖然有現代的新發展，但其遠源仍來自明清時代的中國文化。這樣常識性的說法竟在台北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有幾十個知識份子在報上聯名反駁，說他們只要愛「台灣文化」就很夠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引不起他們的興趣。這也是一種「返本論」，不過這個「本」卻更不容易說得清楚了。

我不願意在這裏對海峽兩岸的「返本論」傾向提出任何評論，我也不敢說這種「返本論」究竟有多大的典型性。但這種現象使我不禁深感憂慮，因為這一傾向繼續發展下去是會造成災禍的。民族主義(包括地方主義)只有在帝國主義侵略的情況下才有積極的意義。如果無的放矢，至少也會造成心靈閉塞的狀態。如果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轉變成侵略性質，其後果則不堪設想。30年代德國的納粹運動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是前車之鑑。

中國今天確有文化認同的危機，但解決之道決不在於煽揚民族狂熱的情緒。文化多元論並不涵蘊着在許多個別民族之上不再有某些共同的人性標準，也不涵蘊着文化與文化之間不能有真正的溝通。這些問題都應該深入討論，可惜這裏不能詳說了^③。

註釋

①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p. 24-26.

② Aaron I. Gurevich: "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Diogenes*, no. 168, vol. 42/4 (Winter 1994).

③ 最近我為《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論文集(台北:東大,1995年9月)寫了一篇兩萬字的自序,題為《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讀者可以參看。